

文化自信、文化协同与文化创新发展

——2017年文化北京研究综述

王林生¹ 金元浦²

(1. 北京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2017年,北京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研究集中在坚持文化自信、谋求文化复兴,产品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等几个方面。研究主题的变化,彰显出文化发展与北京建设相结合实践的复杂性和延展性。

[关键词] 文化自信;文化协同;文化北京“一带一路”;京津冀;文化新业态

[中图分类号] G1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8)01-0031-07

DOI:10.16255/j.cnki.11-5117c.2018.0006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北京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在新的定位、目标和基础上,着力强化城市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文化创新体系,推动城市转型发展。总体而言,北京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人文北京的内涵和外延。2017年,相关著述对北京城市与文化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其重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建设目标和基本要求。其中,文化自信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建设等领域均具有表率 and 示范效应。北京自觉加强文化自信与北京城市发展的紧密结合,以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首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首都理论界从多个角度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阐述。

(一) 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这一论述将文化自信置于世界文明体系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展示出文化自信应有的理论视野。王岳川在世界性的视域中,考察了文化自信对文化建设的意义。^[2]他认为,坚定文化自信是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基础,有利于将中国文化转化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过常宝则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方面阐释了文化自信是中国通向世界桥梁的观点。^[3]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天人合一观念等有助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秦佩、李心峰从与世界文明交往的角度,提出文化自信的特征^[4],认为文化自信在弘扬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探寻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加强艺术学理论建设等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取向。沈湘平则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时代的文化现实,提出理解文化自信的多种角度。^[5]他提出,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维度,文化自信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与以上论者的视角不同,有论者论述了互联网语境中文化自信的内涵。张凯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建设和文化自觉的高度体现,在互联网重构一切领域的时代,增强文

[收稿日期] 2017-11-03

[作者简介] 王林生(1983—)男,山东莘县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1951—)男,浙江浦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化自信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传播和共享方面的优势,构建“互联网+文化自信”的新模式。^[6]以上论者对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意义与价值的讨论,凸显出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丰富性、生长性和拓展性,而正是文化自信内涵的广延性特征有助于中国文化与现实实践进行多维度的结合。

(二) 以文化复兴推进文化自信的实践

文化自信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理念,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强化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更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丰富养分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陈先达在认识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时,将文化自信置于民族生命力的高度,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化自信决不是搞文化民粹主义,单纯否定传统和凝固传统都是错误的,在批判中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7]章伟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能够为人们生活提供价值导向。^[8]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需要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重新融入生活。范周指出,坚持文化自信需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文化传承与创新力度,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9]强化文化创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文化产品这一载体的支撑,有论者从案例分析的路径阐释了传统文化对文化自信的意义。金元浦以《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为例,阐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10]他认为崇高再次成为新时代的审美主旋律,文化叙事的宏伟、壮美和高尚等美学范畴的兴盛,展示出文化自信的中国焕发出的文化活力。可以说,厚重的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无疑考验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传播资源等积极推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如“三个历史文化带”的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与申遗、VR技术助力故宫文化资源“活起来”、“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利用等实践活动,推动了文化传承与北京建设发展的有机融合,不断深化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当前,对北京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梳理已成为北京坚持文化自信、推进北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内容。古都文化、红

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都文化是历史底色,红色文化是活的灵魂,京味文化是生活表征,创新文化是发展动力。协调利用好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的互动关系,是进一步增强北京文化职能,对内强化文化自信,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的必由之路。

二、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优势,通过载体和渠道的打造,融入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

(一) 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产品载体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平台的支撑,加快打造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平台,是北京发挥首都核心职能的重要路径。

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应在立足首都城市定位的基础上,以载体建设为纽带,发挥北京文化引领的优势。北京具有较强的资源聚合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本质是要将北京的影视、展览、旅游、演艺等文化产品以载体的形式布局到“一带一路”的整个产业链上,因此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载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应坚持铸造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品牌企业、旅游、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助力文化交流与交往。^[11]北京的各类企业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业务拓展,目前已在31个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累计金额约为22.4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商务交流、文化服务业等行业,且根据当代消费者的文化需求生产特色文化产品,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12]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水平和特色,刘薇从文化贸易的角度指出,北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带一路”目标市场,实施区域多元化战略,加强对新兴“一带一路”市场的开拓,形成更加合理、多层次的多元发展格局。^[13]在关注一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贸易之外,郭京宁视角独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北京的文物在中外交流中的枢纽性作用。^[14]他指出,文物包含历史上

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烙印,因此文物交流能增进北京乃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二) 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流渠道

交流渠道建设是一个涉及历史传统、资源禀赋、行业基础、技术条件等多方面要素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才能够真正实现渠道畅通。

在政策沟通和信息交流层面,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1世纪“一带一路”与商业文化论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丝绸之路城市合作促进会等在北京举办或成立,在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等,均极大促进了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或信息的共享,增进了双方间的文化互信。

贸易畅通层面是交流渠道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类文化产品及其版权交易需要畅通的交流渠道。霍学文从宏观发展的层面,阐释了北京的金融、产融、资本在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大本营的优势。^[15]他认为北京应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协调处理企业、资本输出、产业转移间的互动关系。在产业的交流与互动中,北京应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推动作用。北京作为中国出版产业的重要基地,出版产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北京出版集团以版权贸易为抓手借助展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销售中国的优秀图书,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16]当然,出版仅是整个产业驱动中的一部分,许多以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期待分享“一带一路”中潜在的万亿元蛋糕。而便捷的交通无疑是能够分享万亿蛋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刘波认为,北京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应着力于强化北京国际航空港的地位,加强与中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互联互通,支持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17]可以说,实现贸易畅通需要产业硬件和设施硬件的强力支撑。

与上述硬件条件相比,民心互通则构成了渠道建设的软性条件。在推进产业共享共赢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风险。吴冰冰、于运全等从促进文化沟通、尊重文化差异、推动文化适应三个角度,选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国家,对北京及其它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可能面对的风险、注意

的问题、借鉴的方法进行了阐述,为中国的企业、机构和人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既需要发挥优势产业的驱动效应,也需要找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痛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

三、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京津冀一体化是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整体战略中,随着首都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进程的日益推进,通州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的使命愈加凸显。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与实施,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但是由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复杂性,文化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功能。

(一) 发挥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文化引领作用

产业协同是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实现产业协调发展的策略。鉴于京津冀各自的文化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在推进京津冀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北京优势,主动搞好北京与规划、政策和项目的对接,筹划城市间的全新组合。^[19]而推进三地的重新组合,需要统筹三地的空间布局。叶堂林、毛若冲认为,北京在空间统筹方面,应通过适度压缩生产空间、优化生活空间、扩大生态空间等路径,带动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20]带动周边区域应注重发挥北京的产业优势,从外部为京津冀提供发展动力。^[21]在所有的产业中,陈静芳等特别关注影视产业基地建设,认为北京与河北、天津在影视产业的发展上可以优势互补,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应在统一的规划体系下进行,但是由于存在着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22]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京津冀三地始终未能做到协调统一。虽然近年来京津冀三地通过签署文化合作协议、举办文化联展等活动,增强了三地文化间的互动,但在文化资源和相关产业的互联、互通、互享层面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北京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层面应作出突破与创新,以形成京津冀三地合力共生的发展格局。

(二) 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赋予通州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利用文化提升城市发展的品质,塑造优美的城市形象,通过文化和商务功能的聚集,建设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是通州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易言之,公共文化服务是推动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文化通州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方向,以公共文化服务提升通州的文化品质是副中心建设的重要议题。郑瑞芳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指出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提升通州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23]而为保障文化的稳定发展,需要从城市实体空间和城市文化的整体性上进行规划设计。对于文化整体的系统性规划与利用,一方面应整合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应传承和发展通州的城市文脉。通州的历史文化可上推至战国时期,悠久的历史是城市副中心发展不可多得的财富。孙劭指出,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信息,就是留住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有助于将通州建成一个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24]运河文化是通州人文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妙弟指出,应强化对通州运河文化的整体性保护的力度,形成统一有效的工作机制。^[25]可以说,尽快形成系统和稳定的城市发展规划,加快整合通州文化资源,是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 探索以文化助力雄安新区发展的新模式

2017年,中央决定在雄安设立国家级新区,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的优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蔡之兵认为,雄安新区建设能够发挥首都城市核心增长极的作用,通过新区建设能够平衡南北区域经济、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以及推动城市的内生型增长。^[26]而探索城市的内生型增长,需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范玉刚认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培育和文化空间规划既要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又要超越现有资源利用模式,脱离现有路径,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注重文化与科技、高端经济形态的融合,以新的文化业态塑造城市文化场景和文化品位。^[27]在利用文化资源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策略上,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诸多论者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思考。周振国强调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对城

市发展的意义^[28],田林、马全宝则强调文化遗产对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性^[29]。与以上两位论者视角不同,范周着眼于文化资源、产业发展与民生三个现实维度,提出应以大文化的视野,总揽雄安新区建设全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探索新区发展,注重高精尖的产业驱动效应,以雄安为范本,找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理论增长点。^[30]可以说,雄安新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对丰富和拓展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四) 提升特色小镇的文化承载功能

特色小镇建设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加快特色小镇建设不仅具有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人居环境等作用,也能够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实施中承载相关产业,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功能融合对接和共同繁荣,树立现代化超大城市城乡治理的典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特别强调了特色小镇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2016年10月,经国家认定的首批特色小镇数量为127个,其中北京3个,分别为房山区长沟镇、昌平区小汤山镇、密云区古北口镇。从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来说,特色小镇是创意城市的重要补充,它是城镇践行文化创意的重要实践。北京打造的特色小镇以功能性为主,这就意味着在特色小镇的打造中,需要产业支撑,需要培育特色产业以发展小镇经济。如北京(房山)基金小镇等。赵方忠指出,北京(房山)基金小镇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和城市聚集轴的起点,是北京产业拓展的重要方向,有助于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31]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有论者还分析了北京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特色不强、资源配置渠道单一、市场配置作用不足等。^[32]针对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曾江、慈锋等认为,建设特色小镇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协调好要素调节、结构调节、文化传承等诸多功能。可以说,北京发展特色小镇,需要在探索中破解存在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当前城镇化面临的诸多发展不协调问题,才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小镇承载力的同时,还能够更好地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相对接,积极承载转移项目,打造出一批具有产业功能的大学镇、总部镇、高端产业镇,实现特色小镇更为宏伟的价值目标。

四、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这一重大政治判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促进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必然选择,而发展文化新业态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围绕文化新业态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首都诸多媒体和学者进行了大量讨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元浦说文”、《前线》杂志等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对此关系进行了剖析。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文化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文化领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在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需求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方面,在文化供给领域存在着文化产品的无效供给、重复供给、低端供给等现象。文化产品原创能力差、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高,缺乏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精品。^[33]因此,必须在产业供给侧通过改革带动新需求、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培育文化新业态。但是在文化新业态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现象,王林生认为产业垄断、圈地运动、侵犯知识产权、干预消费者选择、危及隐私安全等对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34]柴冬冬考察了文化产业在通过自媒体传播过程中营销的功利化、产业秩序的失衡、受众选择权的弱化、产品评价的极端化与产品的过度消费等诸多违反伦理的状况。^[35]可以说,在发展文化新业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文化新业态是推进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文化新业态已展示出较为旺盛的发展活力,“网红经济”“二次元经济”“众筹经济”“直播经济”“虚拟经济”等发展迅速。乐视云开启“直播+”云生态、百度云服务等也在各自相关领域提供了多彩的文化内容,丰富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实践。北京是文化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城市,这在于北京有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如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13964.3亿元,位居

全国前列。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是文化产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展会,至今已举办12届。2017年北京文博会期间,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交易、艺术品交易、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额将近千亿元人民币,极大地展示了北京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层面的影响力。

文化业态创新是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者对文化新业态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魏鹏举、戴俊骋从产业机制层面认为,文化新业态之所以涌现出来,在于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格局已经形成,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融合发展的战略格局将得到体制机制的支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通在实践与制度层面上都实现了重要突破。^[36]陈少峰、李源则从产业模式创新的角度分析了新业态出现的市场机制,认为系列微电影持续孵化IP和文化电商,推动了以IP为基础的新业态的形成。^[37]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创意人才培养的关系也是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金元浦从人力资源的视角,指出文化新业态得益于大量创意人才的培育,北京拥有着一批极度推崇个体创造性的创客群体,奠定了文化新业态涌现的人力基础。^[38]尤其是为了积极培育城市创新氛围,激发人们的创意兴趣,2017年5月,北京举办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突出文化创新与创意,聚焦小微文创企业,通过大赛整合资源,搭建文化领域新的创新创业平台,推进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

(三) 满足公众对高品质文化的需求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的价值追求

破解文化领域的不均衡不充分,既需要充分发展文化新业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也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祁述裕指出要解决文化发展中经济深层次存在的问题,优化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型。^[39]孔少华、何群则重点关注文化发展中的资金投入模式,认为应着力处理好各种供给要素的配置优先级,加强金融PPP模式的落实和项目落地,以“文化+”理念提升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率,化解过剩产能。^[40]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者指出在破解供需矛盾时应关注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与“90后”文化消费群体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张颐武认为,从文化潮流的角度看,“90后”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产业的新兴主体,其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将会为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增长

极”。^[41]可以说,培育文化新业态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消费,只有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耦合,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协调统一,才能破解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问题。

总体来看,以培育文化新业态来促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看到了文化新业态在产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创造力。虽然文化新业态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构成了文化创新发展的推动力。

尤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文化发展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也存在着不可多得的契机。在文化与互联网日益融合的时代背景中,人们的生活交往、工作方式、商业模式、企业形态、文化传播、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把握文化机遇,在继承和创新中解决存在的问题,而这也必将为文化研究、文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越来越多的命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2] 王岳川《世界视阈下的中国文化自信》,《前线》2017年第1期。
- [3] 过常宝《文化自信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神州学人》2017年第2期。
- [4] 秦佩、李心峰《“文化自信”语境下艺术理论研究的“中国”取向》,《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1期。
- [5] 沈湘平《从使命高度理解和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 [6] 张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自信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6期。
- [7] 陈先达《文化自信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新西部》2017年第17期。
- [8] 章伟文《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源泉》,《人民论坛》2017年第23期。
- [9] 范周《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前线》2017年第11期。
- [10] 金元浦《审美时代的终结与传统美学精神的重张——从〈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谈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0期。
- [11]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北京以“四个平台”为支撑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北京》2017年第6期。
- [12] 赵鹏《北京制造拥抱“一带一路”》,《北京日报》2017年5月10日。
- [13] 刘薇《“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文化贸易发展新思路》,《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 [14] 郭京宁《北京文物中的“一带一路”》,《人民周刊》2017年第14期。
- [15] 霍学文《北京金融、产融、资本大本营功能服务、助推“一带一路”》,《国际援助》2017年第3期。
- [16] 雷宇洁《北京出版集团 版权输出向“一带一路”地区延伸》,《国际出版周报》2017年4月17日。
- [17] 刘波《“一带一路”背景下北京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研究》,《城市观察》2017年第1期。
- [18] 吴冰冰、于运全《“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文化篇》,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 [19] 文魁《彰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北京优势》,《前线》2017年第9期。
- [20] 叶堂林、毛若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如何发挥龙头作用》,《前线》2017年第8期。
- [21] 沈芝《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定位对河北的机遇与挑战》,《经济论坛》2017年第5期。
- [22] 郭娅丽《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治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 [23] 郑瑞芳《北京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国际比较与启示》,《中国统计》2017年第3期。
- [24] 孙勖《留住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
- [25] 张妙弟《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保护》,《北京观察》2016年第7期。
- [26] 蔡之兵《雄安新区的战略意图、历史意义与成败关键》,《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8期。
- [27] 范玉刚《雄安新区的文化空间建构和价值传达》,《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28] 周振国《加强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共产党员》2017年第14期。
- [29] 田林、马全宝《雄安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活力复兴》,《人民论坛》2017年第24期。
- [30] 范周《雄安新区研究的新理论增长点——基于文化、产业、民生的现实维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 [31] 赵方忠《北京基金小镇争锋新金融》,《投资北京》2017年第4期。
- [32] 民革北京市委员会《推动北京特色小镇建设》,《北京观察》2017年第4期。

- [33] 范周 《以文化精品检验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社会科学报》2017 年 11 月 2 日。
- [34] 王林生 《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道德失范与伦理构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 [35] 柴冬冬 《文化产业视域下自媒体传播的伦理维度》,《甘肃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 [36] 魏鹏举、戴俊骋 《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格局形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 [37] 陈少峰、李源 《文化产业领域 IP 孵化与艺术生产商业模式创新》,《艺术百家》2017 年第 4 期。
- [38] 金元浦 《创客时代:一个创意集群的成长》,《中国文化报》2017 年 8 月 12 日。
- [39] 祁述裕 《经济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智慧中国》2017 年第 Z1 期。
- [40] 孔少华、何群 《“十三五”文化产业供给侧要素创新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 [41] 张颐武 《90 后与当下》,《社会科学报》2017 年 5 月 25 日。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2017 Research of Humanistic Beijing

WANG Lin-sheng¹ , JIN Yuan-pu²

(1.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and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2017 ,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in Beijing. The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adhering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eking cultural rejuvenation. Producing carrier and constructing channel ar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and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al formats. The changes in research focus highlight the complexity and malleability of combining practice with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eijing’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ynergy; cultural Beijing; The Belt and Road;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new cultural formats

(责任编辑 孙俊青)